

“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化

王毅

在“文革”的诸多动因之中，巫术文化的作用极少为人们注意，但实际上，两者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在于：1.抄家、揪斗、大批判、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亿万人动手在各种图文的字缝里搜觅“反动标语”等等“破旧立新”的狂潮，其手段多是最古老的巫术方法；2.“文革”不仅在无数具体行为方式上向巫术文化“返祖”，而且在宇宙模式、思维逻辑等更深刻得多的层面上，与巫术文化高度契合；3.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原因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某些时候积极利用巫术文化，因此造成了周期性的“举国若狂”。而近代以来外来文化空前猛烈的冲击，也刺激了中国本土巫术文化自卫机制的爆发。巫术文化的这种对内和对外的文化功能，都对“文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者：王毅，男，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辑。

从文化发生学和文化运行机理的角度来看，“文革”显然与中国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西方的法国革命、俄国的民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等复杂众多的文化因素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在这众多的方面之中，“文革”与巫术文化的联系，也许是迄今人们关注最少的领域。而这种关注程度之低微，与巫术文化对“文革”影响之巨大，是极不成比例的。下文拟从三个方面简要地叙述这种影响。

一、“破旧立新”狂潮下的文化“返祖”

始终以“破旧立新”、“砸烂旧世界”等等的极端激进主义为旗帜的“文革”，竟然会与比中世纪专制文化更古老得多的上古巫术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初听起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只要随手举几个人所共知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立刻回想起巫术文化在“文革”时的泛滥。

“文革”时流行的在“黑帮”姓名、照片上打叉，或将其姓名倒写、横写，或进而变易其笔画，如将“打倒刘少奇”之“奇”字横过来并将其中几笔加长，写成“打倒刘少狗”，又如用谐音字将“打倒朱德”改写成“打倒猪德”，等等，以此来表示对被打倒者的一种极度的诅咒和仇视。我们说：造反派的这套办法，是原封未动地从巫术文化中照搬过来的。^①原来，巫术时代的人们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必然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渗透到诸如头发、唾液、指甲等身体的一切部分以及影子、画像、姓名、生辰等与他相关的物体之中。因此，只要戕

^① 汪曾祺先生说：“在人的姓名上打叉，是个由来已久的古法，……不知怎么被造反派考查出来，沿用了。其实，这倒是货真价实的‘四旧’。至于把人的姓名中的字倒过来写，横过来写，以为就可以产生一种诅咒的力量，可以置人于死地，于残忍中带有游戏成分，这手段可以上推到巫术时代，其来历可求之于马道婆。”（《汪曾祺自选集》，第365页）

害了这些物体中的任何一种，都注定要相应地置该人的灵魂于死地。这种迷信广泛存在于世界许多民族的原始宗教之中，所以它们普遍对上述物体有种种严格的禁忌，例如剪下的头发必须埋于隐秘之处，以免落入敌手而被施以降灾巫术（亦即人类学著作中所谓的“黑巫术”），又如许多氏族部落的居民至今非常害怕别人给他们绘画和摄影，也严禁别人踩自己的影子，亦决不把自己的真名告诉外人，因为他们认为，敌人随时都可以通过施法于影像、姓名而杀死自己。在中国，人们同样曾经长久地信奉过这种“黑巫术”，例如《封神演义》中的“呼名落马”、《西游记》中孙行者一被妖怪叫住名字即同时被装入瓶中、《红楼梦》中的马道婆欲通过加害于纸人木偶而杀人于无形等等，就都是例子。而“文革”时在人的姓名、照片上打叉等种种造反手段，则不过是这种古老的诅咒巫术和降灾巫术的大普及。

再如“文革”时有一句震天响的革命纲领，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们为什么会把驱除牛鬼蛇神作为第一要务呢？原来，这种狂热源出自古老的驱鬼巫术。上古先民认为：人类的一切灾难，都是身边千奇百怪的各种鬼神兴妖作祟的结果。要想有正常的生活和秩序，就必须运用一切手段遏止鬼神的侵害。因此，驱鬼巫术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中普遍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例如在广东黎族地区，人们认为“禁鬼”（即病魔）具有极大的魔力，它能使人生病、使牲畜无故死亡、使庄稼遭虫灾等等。“禁鬼”又附在村寨中某些人的身上，这些鬼魂附体的人被称为“禁公”、“禁母”。他们随时都可能用巫术手段对周围的人造成伤害，因此他们被视为全民公敌。一旦有人生病，就需要立刻请巫师来查出禁鬼和禁公、禁母的所在。在这种审查过程中，任何无辜者都可能被指控为禁公、禁母。人们用极残酷的手段处置被查出的禁公、禁母：对那些被判定为有意识用禁鬼危害别人者，通常是当众或暗中将其杀死；对那些被认为仅是因自己不洁的灵魂化为禁鬼去害人而自己又茫然不觉者，则采取脱胎换骨地改造后“给出路”的政策，即把该人赶到河里去洗澡，然后换上别的衣服，以示妖祟已从他身上离去，或由巫师带他过火堆，或把他捆起来，用这类方法以示从他身上赶走了妖祟。^①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亦记述了世界许多地方类似的巫术裁判。例如澳大利亚土著人往往根据昆虫爬行的方向、土地裂缝的方向等捕风捉影地断定魔鬼的来源。在法属刚果，“当某个重要人物死了，或者某个人死得可疑，就立即召集死者的亲属、仆人有时甚至全村人，这时‘巫医’开始巫术仪式，这些仪式必定能揭露犯罪者。……在这些集会上，即使是最勇敢人的一想到会点他的名，一瞬间就要被判罪，作为大众咒骂愤恨的对象而死去，毫无希望被判明是无辜，他也要浑身发抖。诚然，被判决的人有时是立刻处以死刑。但有时他还得受神意裁判。”^②显然，这类为发现魔鬼而举行的种种巫术活动，无一不与“文革”时深挖牛鬼蛇神的狂潮极其神似。

又如“文革”时的抄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以下程序：

1. 对被害者施以剃阴阳头、挂黑牌、强迫穿丑恶的服饰等暴行，使其在形体上“不齿于人类”；
2. 对居所砸抢的同时，彻底侮辱居室的形象，例如贴满“打倒”、“砸烂”之类的标语、漫画，倾倒秽物脏污墙壁，等等；
3. 彻底破坏书、乐器、文玩等维系其人精神世界的文化用品。

^① 见覃光广等编著《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417页。

^② [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4、273页。

为什么“抄家”一定要包括上述内容呢？翻翻古籍就可以知道，“文革”的这一套乃是照搬了上古一种名曰“汙淄”的降灾巫术。上古先民认为：本氏族的生存完全出于祖先神的恩庇，所以对祖先神的崇拜以及相应的宗庙之存废，是全氏族生命攸关的大事。“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①为了消灭敌对氏族，也就必须铲除其祖先神的庇护，因此众多典籍中都记有对敌国“泯其社稷”、“毁其宗庙”的蛮风。^②根据考古发掘和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可知，上古时代，宗庙与宫室常为一体，即所谓“择宫之中而立庙”^③，“将营宫室，宗庙为先”^④。故此，上述对敌人宗庙的破坏亦同样被施之于敌人的居室，以求摈绝神灵对居所和居住者的庇护。《汉书·王莽传》即记：“古者畔逆之国，既有诛讨，则猪其宫室以为汙池，纳垢浊焉，名曰凶虚。……（遂）汙池刘崇室宅。后谋反者，皆汙池云。”这类通过污毁住宅而施祟降灾的巫术方法在历代都十分流行。尽管没有几个红卫兵读过《汉书》，但他们抄家时却不约而同地谨奉着巫覡的古法，这真是暗中有鬼神相助！上古先民还认为：形貌、肢体毁伤者不能为神灵附祐，故“大辱加于身，支体毁伤，……祭不得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⑤因此旧日对罪犯都要施以黥、髡（剃发）等使身体发肤致残的刑法，并强迫他们穿赭衣以向神灵昭示己恶。向祖先天帝请罪者，亦必须剪去头发。所以，红卫兵的剃头揪斗、挂黑牌等等暴行，亦不过是重新振此巫风而已。又因为在上古时代，书籍和礼器等文化用品，是子民与祖先神相沟通的工具，^⑥所以也就总是被敌国视为最危险的东西而予以加倍暴虐和彻底的破坏，即《国语·周语下》所谓“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这种源于巫术文化的恐惧心理长久地支配着人们的文化政策。例如隋文帝“以平陈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⑦。又如直到清代，人们仍习惯于用火焚、诅咒、污毁等巫术手段对付异端书籍。^⑧

二、“文革”与巫术文化在宇宙模式和思维逻辑上的契合

与“文革”使巫术文化在上述这些具体个别的行为方式和操作手段上的复活相比，更重要得多的事实是：在宇宙模式、思维逻辑、文化体系的整体结构等更深的层面上，“文革”与巫术文化之间有着高度的契合。只是因为有了这种根本的契合，“文革”在无数具体个别事例上的“返祖”才具备了强烈而统一的内在动因。

仍以驱鬼巫术为例。驱鬼在上古先民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并非出于偶然或暂时的原因，而是由此时人们对宇宙的基本认识所决定的。在他们眼里，从整个宇宙到自己生活中每一最细微的环节，都是由鬼神的力量支配的。所以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对于蛮野人，一切都是宗教，因为蛮野人恒常都是生活在神秘主义与仪式主义的世界里

① 《吕氏春秋·务本》。

② 见《左传·宣公十六年》、《孟子·梁惠王下》、《吕氏春秋·知化》。又如《墨子·天志下》：“焚烧其祖庙”；《淮南子·本经训》：“毁人之宗庙”。

③ 《吕氏春秋·慎势》。

④ 《礼记·曲礼》。

⑤ 《白虎通义·丧服》引《礼记》佚文。

⑥ 详见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中《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一章，三联书店1983年版。

⑦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⑧ 沈起凤：《潜锋》，卷三《烧录成名》：“凡遇得罪名教之书，须拉杂摧烧之。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盖投诸浊流，冀勿扬其波也。”

面。”^①列维—布留尔则更详细地论述了世界各地巫术文化的这一通则：

原始人感到自己是被无穷无尽、几乎永远看不见，而且永远可怕的无形存在物包围着。……鬼神布满了整个天空和每寸土地，它们在道路边、树林中、岩石上、山里、山谷里、河溪里窥伺着人。它们日夜不倦地跟踪着人。……甚至在自己家里，人也找不到逃避鬼神的避难所；它们在家里也到处都有，它们隐藏在墙上的泥灰里，吊在屋梁上，粘在隔板上。……^②

显然，正是这种具有根本性的神秘宇宙模式和宇宙秩序，才决定了巫术时代人们一切具体的行为方式和准则；而人们为了免受鬼神的侵害而进行的驱鬼活动，亦是这派生的结果之一。随着神秘宇宙模式的不断精致化，人们对无数鬼神及其行为特征也做了越来越详细的界定。而在驱鬼巫术中，遂有氏族集体驱鬼、家庭个人驱鬼及定期驱鬼、随时驱鬼等与之相对应的手段。对于神秘的巫术宇宙模式内的这种结构关系，弗雷泽在其人类文化学巨著《金枝》之中做了清晰的分析。例如此书第五十六章题为《公众驱邪》，而对于“公众驱邪”这种巫术形式，弗雷泽把它分解为三段式，即此章三小节的题目：《无所不在的邪魔》、《随时驱邪》、《定期驱邪》。不难看出：“无所不在的邪魔”是巫术文化总揽万类的宇宙模式，而随时和定期“驱邪”则是置身其间者唯一的生存手段。

如果我们能够由“公众驱邪”，联想到同样是“群众运动”、同样旨在驱邪除鬼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等等文化狂潮，立刻就会愕然于巫术文化与“文革”的惊人吻合：“文革”的“群众运动”之基础，同样是建立在充满妖魔鬼怪的宇宙图式之上的。与巫术时代极为相似，我们也无比强烈地感到自己是被“黑五类”、“黑七类”、帝修反、走资派、黑帮黑线、钻进革命营垒中的毒蛇、披着羊皮的狼、糖衣炮弹之类“无穷无尽、几乎永远看不见而且永远可怕的无形存在物包围着”，即毛泽东在1964年7月5日与毛远新谈话中所说的“阶级斗争到处都有”。而只有随时和周而复始地驱除这些无穷无尽的邪魔，才能免除“重吃二遍苦”、“千百万人头落地”的灭顶之灾。一如弗雷泽在《无所不在的邪魔》结尾对原始人的描述：“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能摆脱这些可恶的折磨鬼，他们就能重新生活幸福而清白。”^③这才有“文革”中所说的“七亿人民不斗行吗”。在这种宇宙图式的基础上，“文革”等群众运动亦同样被精要地概括为三段式：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路线斗争七、八年一次。这“新三段”竟然与巫术时代“群众运动”（公众驱邪）的“老三段”（无所不在的邪魔；随时驱邪；定期驱邪）锱铢相侔、不忤毫厘。如此鬼斧神工，真让人不胜浩叹！

有了宇宙模式和思维逻辑上的冥合，“文革”与巫术文化在其它无数具体方法上的形神俱肖，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例如驱鬼与“清理阶级队伍”时同样极端神经质的捕风捉影，都不是无谓的虚妄与颠狂，而是居身神秘的邪魔“场”中必然的生存机制与心理效应。与一般政治斗争中的阴谋诬陷不同，驱鬼和“清队”的捕风捉影首先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那既无所不在又无穷无尽的神秘力量的。因此，全民在搜索这神秘力量时才可能普遍具有那样强烈而又永不止息的发现欲望，并创造出千奇百怪的检验方法，例如前文提到的土著人根据土地裂缝的方向确定妖魔的所在，又如“文革”时在各种图文的字缝间搜觅“反动标语”

①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② 《原始思维》，第58—59页。

③ [英]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83页。

(显然是图谶巫蛊术的复兴)。这种思维逻辑即是文化人类学家们反复强调的:在巫术文化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偶然的東西,……它给任何使它惊奇的事件都凭空添上神秘的原因。由于神秘力量永远被感到无处不有,所以,我们越觉得偶然的事件,在原始人看来则越重要。这里不需要对事件的解释;事件自己解释了自己,它是(神的)启示。”^①反过来,人们对牛鬼蛇神的寻觅越狂热,他们也就越深地陷入了神秘力量的包围与重压:全民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确保自己的心中和身边没有潜伏着魔鬼,也没有谁确知自己明天会不会被揪出来示众。其结果就是巫术时代和“文革”时代特有的那种全民性的精神恐惧症。^②再如“文革”时广为流行的“砸烂狗头”、“油炸黑帮”等等凶残的诅咒语言,这些语汇及其所描述的酷刑亦同样源于原始人在牛鬼蛇神的包围和压迫下发明的抗衡手段。例如历代举行驱鬼仪式时,都要万口齐呼对鬼的最残酷诅咒:“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③而在一些地区,当相对温和的巫术方法不足以震慑恶鬼时,就必须架起油锅,炸鬼的模拟物以求得神效。^④又如“文革”时全民对“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狂热信奉亦显然脱胎于巫术时代的原始崇拜:既然神秘的力量是世界的唯一动因,那么万民万物的幸福就唯有依靠善神的赐予,亦如一切或大或小的灾难都只能来自邪魔的降施一样。例如流行于东北、内蒙等地的萨满教,其宇宙模式是由人居住的“地上国”、神居住的“天上国”、魔鬼住的“地下国”三部分组成。魔鬼不断地从黑暗的地下国向人间施放各种疾病,而护法神的天职即是降临人间赐福除灾。所以在萨满教中,神的总名干脆就叫“下凡天”。请看萨满(巫师)的请神歌:

蓝色的天啊,顺着天边下来吧,拽着神树的枝叶啊,快来解除灾患啊哈嗨!蓝色的天啊,顺着天边下来吧,主持天的公道吧,为百姓救苦救难哈嗨!^⑤

一望可知,《东方红》所谓“大救星”、“谋幸福”、“得解放”、“照到哪里哪里亮”云云,无一不是从这类原始崇拜中衍生出来的。正因为文化机理上的一致,所以在许多细微末节上,二者都如出一辙。例如在请神仪式上,每当萨满唱完上面歌辞中的一句时,“通常都由参加祭天的人们众声齐和‘呼咧,呼咧’,表示上天已经飘飞而降,形成一片呼天叫天的神秘气氛。”^⑥其实,这种场面和气氛,也是我们在“早请示”、“晚汇报”等“文革降神礼神仪式”上领略过无数次的。

详细分析“文革”与巫术文化在众多方面的契合,需要一本专门的著作才能完成。但上面的简述至少可以表明:这种契合乃是由于文化机理深层次的需要,而并非出自偶然或个别的原因。对中外巫术文化的研究都证明,它的产生原是建立在最真诚和最广泛的社会需要之上的。例如丁山先生总结甲骨文所反映的上古宗教时说:“我相信那时王朝的一切祭典,不会是形式主义,不会是有意装腔作势地虔敬鬼神。”^⑦西方学者也指出:“巫师并非起源于欺诈,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和系统化了的伪科学,一个诚心诚意但又是荒谬的哲学

- ① 《原始思维》,第359页,参见[德]利普斯:《事物的起源》,第十三章《巫术和不可知的力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 ② 例如,“在大寨,无论是牛死马伤,还是开玩笑、说闲话;无论是打扑克、戴手表,还是穿花衣服,……都有触犯‘阶级斗争’的可能。轻者扣工分、扣口粮,重者挨批斗,有的甚至被逼自杀。”(孙启泰等:《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 ③ 详见《续汉书·礼仪志中》、《通典》卷七十八、《文献通考》卷八十八等。
- ④ 参见吴真:《大山里的鬼神世界——浙西南山区信仰民俗调查》,《中国民间文化》1991年第2辑,第45页。
- ⑤ 详见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15页。
- ⑥ 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第16页。
- ⑦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第541页。

体系。”^①很显然，巫术体系的这些文化特征，依然是与“文革”的内在逻辑完全吻合的。

三、巫术文化周期性爆发的原因及其与“文革”的关系

研究巫术文化与“文革”的关系，当然必须说明上古以来巫术文化沿革的具体过程，尤其要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开化最早又长期尊崇礼教的国家，低级原始的巫术文化何以能够始终繁衍不绝，以及它与民众社会、皇权、士大夫这三大主要阶层各自具有怎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又是怎样相互交织影响的，等等。不过，这些问题的历史跨度较大，头绪也较多，限于篇幅，笔者只好另文详述。笼统说来，巫术文化在周秦以后的中国社会中虽然依旧广泛存在，但它毕竟因受到理性精神和国家制度的有效制衡而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经常处于蛰伏和半蛰伏的状态。然而另一方面，巫术文化又总能在一段抑制期之后重新爆发，甚至形成诸如“文革”那样“举国若狂”的巨大效应。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巫术文化这种周期性的爆发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巫术文化在“文革”时期的爆发格外猛烈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巫术对内和对外的文化功能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回答。

综观中国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每当政治矛盾趋于尖锐，而统治者利用常规行政手段仍不足以控制局面时，他们往往会在“神道设教”传统的驱使下，人为地促使巫术文化迅速膨胀，制造普遍的宗教狂热以神化自己、克敌致胜。王莽、武则天等的大崇巫鬼，直至后来出于“路线斗争”的需要而自觉利用“个人迷信”的狂潮，就都是世人熟知的例子。《汉书·王莽传》详细记述了王莽在其政治生涯的中、晚期，迫于政治斗争的形势而日益“好为鬼神怪异之事”，竟而使厌胜巫鬼“不可胜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巫术运动的发动者深深自溺于神秘力量的包围而无力自拔，而且原先蛰伏于各社会文化层面和角落的巫术文化因素都同时被激活和放大。所以与当时符命图讖、鬼神方术的铺天盖地^②完全同步的，是各式千奇百怪的“敢想敢干”和“群众性发明创造”的盛极一时：

又博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待发。

又多遣大夫谒者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③

可见，后世的全民大种“卫星田”、大炼钢铁、大造单晶硅、人人吃小球藻或人造肉等等，无一不具有久远的文化渊源和深广的宗教心理基础。此类周期性爆发的典型例子又如宋真宗在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后，深以自己的对外屈膝苟和为耻。为了遮羞，他与诸佞臣合谋，诡称得天书符命，并大兴封禅。于是全国上下、夷夏僧俗，一起卷入声势浩大的巫术运动的狂潮。当时动辄“文武官、将校、蛮夷、耆寿、僧道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余人诣阙请封禅”；道观神庙遂遍及天下，亿万种祥瑞亦“不可称记”。在这派莺歌燕舞景象的映衬下，大救星的神光也就格外耀眼：“自封禅之后，士大夫争奏符瑞，献赞颂。……晏殊献《河清颂》，帝作《奉天庇民述》”；“群臣上帝尊号曰：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这出丑剧足足闹了15年，^④可惜人们依然如以前一样，弄不明白这一次又一次举国

① [美]J·古德著、张永创编译：《原始宗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21页。

②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王）莽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鸞雁，犬当麋鹿。”

③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④ 详见《宋史》卷八《真宗本纪》，《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五《宋纪·真宗》，《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三《天书等封祀》。

若狂的原因，所以《宋史·真宗本纪》只能这样结尾：“真宗英晤之主，……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中国巫术文化周期性爆发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每当社会常规的统一宗法组织系统陷入周期性瘫痪（即孟子所说“一治一乱”）之后，各种原属社会下层和非常规的组织系统（如坞堡、秘密会社、流民军事集团等）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即迅速增加。而庞杂的巫术文化不仅是社会失范时人们的精神支柱，^①而且往往直接就是这些非常规系统的组织手段，这就象尊卑有序的国家宗教体系是常规国家组织的支柱一样。因此，诸如五斗米教那种政、教、军合一的集团在中国历代成千累万。正因为巫术文化此时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非常规状态下的社会组织功能，所以它的能量也就巨大得惊人。例如北魏后期天下大乱，术士刘灵助“自谓方术堪能动众，……遂刻毡为人象，画桃木为符书，作诡道厌祝之法，民多信之。……由是幽、瀛、沧、冀之民悉从之。从之者夜悉举火为号，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②。这类集团还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1.只有在极大地破坏了常规组织系统之后，以狂热的巫术和宗教信仰为精神纽带的政、教、军三位一体的组织才能建立；2.由于其政治、军事组织是建立在对某种宗教教义、某一具体教主的狂热崇拜基础上，所以一切对异教者的敌视，都立即升格为借助政治和军事手段的残酷围剿，即上文描述的“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阿Q那样的孱头一旦造反，也照例要对王胡、小D等侪辈赶尽杀绝）。如果从这种遗传特性来看，“文革”时亿万“造反团”、“战斗队”等非常规组织何以能一夜之间席卷全国，他们何以普遍地沉溺于“砸烂旧世界”的狂暴之中，何以执拗地把“斗、斗、斗”作为唯一的社会准则；何以连家庭这样最细微的社会常规组织，都要被破解为两派、三派；何以不论怎样号召“要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派仗”和“武斗”的血腥仍然笼罩全国；……诸如此类的现象就都有其深刻而久远的文化原因和宗教心理基础。

以上从中国文化的内因简述了巫术文化在“文革”爆发的契机。不过我们也还应指出：对于一切外来文化的抗拒，亦是“文革”最重要的内容和动因之一。从文化发生学来看，这种无比强烈的拒斥性亦与巫术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巫术因素在近代以来空前巨大的外来冲击下，曾被极大地激活，从而一次又一次地促成了巫术文化的大爆发。

众所周知，氏族间的文化壁垒是巫术文化的重要特征：每一氏族都必须随时强调自己图腾的独特和神秘，并进而建立起对异氏族和异图腾的本能抗衡机制，否则就无“氏族”可言了。这就是古人反复强调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③，“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④。所以各氏族的祭祀只能由本族巫师主持，^⑤祭祀仪式中祖先神的扮演者亦必须严格在本族子孙中选拔。^⑥中国从南到北众多较原始的民族文化中，都有一项共同的禁忌，即本族的祭祀一律禁止外族人介入，在举行祭祀的日子，外人也不许进入村寨。^⑦世界其他地区的氏族文化也都如是，所以他们的一些巫术礼仪决不能在有异教者在

① 王充《论衡·解除篇》：“衰世好信鬼”；曹丕：“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黄初五年》）

② 《魏书》卷九十一《术艺传·刘灵助传》。

③ 《左传·成公四年》引史佚之《志》。

④ 《国语·晋语》。

⑤ 见覃光广等编著《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第40页。

⑥ 详见胡新生《周代祭祀中的立尸礼及其宗教意义》，《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4期，第18页。

⑦ 见张紫晨：《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78页；覃光广等编著《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第221、230、281、342页；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场时举行，“部落以外任何人几乎不让接近这种仪式。”^① 尤为重要的是：本氏族图腾的神性，必然通过神秘的“互渗”而笼罩该氏族的一切生存空间和一切或巨或细的事物，从而形成完整而封闭的文化堡垒。迪尔凯姆精辟地指出：氏族图腾不是别的，乃是氏族本身。^② 列维-布留尔更详细论述了这种神秘的“互渗”是怎样钻进该氏族的过去未来、空间土地、山岩林木，直至每个成员的名字、社会职能等一切事物之中的。由于这文化堡垒中的一切都是由“各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存在物神秘地联系着”，所以如果“改变了哪怕是最小的细部，这些（神秘）属性就不为人所控制了。”^③ 巫术文化之所以坚持其固有的一切神秘秩序而决不允许外来文化对之有丝毫的改变，“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保守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厌恶违反习惯的改变。……（而是）他们害怕由于废弃旧路和改用新路而引起不测的、可能是悲惨的后果。象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一样，小路也有自己的神秘属性。”^④ 因此对于巫术文化来说，对任何外来文化因素的拒斥，都决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的、功利的、暂时的选择，而是维系整个神秘属性、宇宙模式和文化形态生存延续的根本要求；

在这个空间、因果关系、时间全都与我们大不相同的闭塞的世界中，社会的成员们感到自己是与其他一个或一群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存在物联系着的。……这土地在神秘意义上“属于”这个集体。神秘的关系把这个集体的活的与死的成员与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允许该集体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无疑不能容忍其他集体来到这块土地上的形形色色的神秘力量联系起来。……人类集体所居住的土地也是这个集体本身；它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居住，而其他任何集体假如想要占据这块土地并在它们上面定居下来，它就会遭到最严重的危险。^⑤

外来文化因素在陌生的氏族中之所以会遇到“最严重的危险”，就是因为：它的到来必然引发主体文化中原本一体的全部“神秘属性”高度统一的、因而也是极为强烈的排异反应。反过来说也一样：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主体文化中一切具有神秘属性的巫术文化因素，其固有的能量和内部凝聚力会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以形成整体的抗御能力。而在不具备或失去了其它社会制衡因素的情况下，外来的刺激越强烈，对巫术文化的激活也就会以同样强烈的程度爆发出来。

自古以来，人们对巫术文化体系的上述自卫机制是很熟悉的，例如古人反复申明：祖先崇拜的意义即在于“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⑥。而氏族对外战争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通过频繁祭祀本氏族的祖先、山川以求得到图腾格外的庇护，同时用厌胜、诅咒、火焚等最激烈的巫法破除外氏族图腾及其宗庙彝器的神性，即如本文第一节叙述的那样。之所以必须如此，即是因巫术文化认为，异则生鬼：“魑魅，人面兽身四足，好感人。山林异气所生，以为人害。”^⑦ 在许多氏族的宗教观念中，异族人往往就是鬼，而自己与之的敌对更是由异氏族的鬼灵挑起的。^⑧ 秦汉以后，上述氏族时代的巫术观又与“天朝”观结合在一起。例如唐代名相房玄龄说：“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理，

① 详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30页；利普斯：《事物的起源》，第251页。

② 转见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第7页。

③④ 《原始思维》，第1、14、32、34页。

⑤ 《原始思维》，第426页。

⑥ 《国语·楚语下》。

⑦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文公十八年》引服虔注。

⑧ 详见覃光广等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概览》，第237、292页。

古来以鱼鳖畜之。”^①所以，当中国文化在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空前猛烈的冲击，而其他常规手段又远远不足以抗衡时，其体内源远流长的巫术文化自卫机制被极大地激活，也就是必然的。梁启超在其《排外平议》中说：

我中国以排外闻于天下也久矣。…故夫野蛮之世，则排外之心最热，而排外之例最严。家族部落之时代，无不仇待外人。……^②

他把中国近代排外主义的源头上溯到氏族文化的生存机理，这不仅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且与近代以来排外主义中巫术文化大爆发的实际情形完全吻合。例如视西方文化为邪教妖术，是19世纪后期在中国民间极为流行的观念，他们或以《山海经》式的眼光看待西方：“逆夷啖啗喇者，……其种半人而半畜，《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鯪人者也。”^③或干脆认为：“耶稣猪精，……其淫如狐，其诡如鼠。……莫吃迷药（指西药），吃则中蛊。”^④这种以中国本土的巫术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图释甚至到了纤微毕肖的程度。例如在广为流传的《天主教集说》中，此类描述即极为详细：“（西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童男童女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星家多师其术者。……”^⑤人们还认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干犯了宇宙固有的“神秘属性”，因而引得上天震怒以至连年干旱，而“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⑥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动员和凝聚一切本土文化和宗教的力量，以冀抗御西方的压迫就是必然的，所以连青年时代的康有为，也在强调中国巫术文化的天经地义，特别是强调巫术文化与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浑然一体是出于先验的、无可置疑的神圣理由（亦即本文所说的“神秘属性”）：

中国五帝三王之教，父子夫妇君臣兄弟朋友之伦，粟米蔬果鱼肉之食，诗书礼乐之学，士农工商之民，鬼神巫祝之俗，盖天理之自然也，非人道之至也；顺人性而教之也，非学而为之也。^⑦

此类宗教文化观在广为流传的《反洋教揭帖》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阐扬：

我们三教中人或读尧舜各位圣人的经书，或读太上老君的经书，或读释迦观音菩萨的经书，受圣贤仙佛的莫大之恩。想想这鬼叫敢来伤坏我中国几千年的正教，你说可恨不可恨哩。就是不读书一字不识的人，决无一口不受天地日月星辰复载照临之恩的，决无一个不受文昌帝君、关圣帝君、灶君、财神、一切大小神明保佑之恩的，决无一个不受皇上祖宗父母教养之恩的。想想这鬼教敢伤坏天地日月星辰一切大小神明，以及各人自己的祖宗父母……又想谋我中国江山，……你说可恨不可恨？想人人良心不昧，再无一个不想灭尽这天猪鬼叫的哟！^⑧

西方的压迫极大地激活了中国固有的巫术文化，其更典型的例子是义和团运动对民间宗教实

① 《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

② 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469页。

③④⑤ 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21、9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1页。

⑦ 《性学篇》，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

⑧ 《鬼叫该死》，《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199页。以一元本土文化为本位并咒外来文化为“鬼教”、“妖邪”，这是中国巫术文化始终延绵不绝的传统。例如北魏时李谧论佛教之害：“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魏书》卷五十三《李谧传》）又如唐代傅奕上疏称佛教“演其妖书，述其邪法，……而为厌魅，迷惑百姓”。（《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行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动员。

团民上法时，有请关帝、张桓侯、赵云者，有请孙猴、沙僧、猪八戒者，有言姜太公、黄飞虎、岳武穆者，更有请黄三太、窦二墩者。^①

闻西门外有村巫曰金刀圣母，颇著灵异，迎使助战。……尝于地安门外设纸城，令王公大臣罗拜。其下又遍建“替天行道”大旗，谓宋江……不日下降，助平夷丑。^②

除了广设坛台，遍请普天诸神之外，一切被认为能够克敌致胜的巫术方法也都风行天下，例如前引揭帖中将耶稣诅咒为“猪精”，将天主教诅咒为“天猪鬼叫”，又如：

咸丰同治以后……又练新军，仍然全用旗人，因国人都呼西洋人为“洋鬼子”，所以新练之军，赐名曰“虎神营”，以为虎可吃羊，神能制鬼也。^③

武卫军人人佩符，盖以神道事之。……其法上体后刀剑不入，是乃南方巫师之术。……或改东交民巷为“切洋鸡鸣街”、御河桥为“断羊桥”。^④

显而易见，从人们对本土文化“神秘属性”的强化，到厌胜、诅咒等“除妖灭鬼”手段的流行，这套完整的宇宙模式和文化体系，都是直接从巫术文化中派生出来的。

“文革”时代，中国不得不再一次拚命以本土文化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基本前提一旦确立不移，就不论人们有无自觉的意识，巫术文化的上述自卫机制以及图腾情结、宗教热情、传播方式、驱鬼手段等一切巫术文化的功能和属性，都必然被重新激活。而巫术文化的爆发强度，也依然是与对外的拒斥程度成正比并互为强化剂的。因此，“文革”从其世界图式（“只缘妖雾又重来”）到无数十分细微具体的手段，很大程度上都无疑是历史的重演，除了本文曾举出的许许多多事例之外，再说一个更为普通的：1966年下半年“文革”狂潮中最流行的即是大改地名，如将街名改为“反帝路”、“反修路”，将协和医院、友谊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反修医院”，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王反修”、“赵反帝”等等，这些举动显然是“切洋街”、“虎神营”之类厌胜诅咒的翻版。不同的是，由于“文革”时已经不可能遍请传统的普天诸神除妖灭鬼，因而文化体系中重被激活的狂热宗教需求，就只有通过当时唯一的渠道才能得到满足，这就是“万物生长靠太阳”。“文革”时的个人崇拜之所以以古今宗教史上的空前猛烈的程度爆发出来，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本土文化郁积的上述宗教需求，既没有机会为现代文明所改造消解，又被强力束缚在一个比中国传统的多神崇拜远为狭隘的渠道之中。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责任编辑：唐 军

更 正

本刊1993年第1期《北京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调查与研究》一文的作者中的“张彦”应为“孙彦”，特此更正。

①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8页，参见同书80页杨典浩《庚子大事记》。又见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二《义和团史料》上册，第53页。

②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补》，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7页。

③ 《齐如山全集》第七册《北平小掌故》，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第39页。

④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6页。“虎神营”、“切洋街”等事又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35页。